

八步战台古今(上)

张树林

2013年6月16日,天阴着,但云影很高,没有下雨。我和文友范宗兴研究员专程驱车盐池县,观瞻了驰誉全国的历史古迹八步战台。

八步战台位于盐池县王乐井乡小沙窝自然村附近的明代长城头道边的南侧,距盐池县城35公里左右。下午3时许,在村民们的悉心指引下,我们跨过古老的明长城,一眼就看到了曾经高大雄伟如今已经被破坏成一堆废墟的八步战台。它静静地坐落在古老的长城脚下空旷的荒原上,似乎是在嘤嘤地哭泣……我顿觉一阵辛酸!一座雄伟壮丽的古建筑,国之瑰宝,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只有留给历史去沉思吧!

“战台”当初本名为“敌台”,“战台”是当地人们对它的俗称。“入乡随俗”,我们就依其习惯在这里称其为“战台”吧。八步战台建筑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当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战台呢?据宁夏明代《万历朔方新志》卷二中记载:“敌台四:安定堡沙坪最为吃紧之地,以长城内外飞沙拥与墙齐,每岁防秋拨军扒移,艰苦万状。往来使命行旅,屢遭虜贼窃掠,无可退藏。万历三十六年,巡抚黄嘉善檄守备辛志德效云中台式,跨墙以砖石券甃台者

四,每座中可容二百人。台上有亭,登眺遥观,虏在目中。圈内盖房十间,拨军二十名,长川防守。高耸壮丽,足为东路金汤。”

《明实录》卷三百六十中记载说:“兵部覆总督陕西三边尚书李汶条陈边事——至于延(绥镇)之定边、少(疑为“沙”一作者注)梁,宁(夏镇)之安定、沙坪——沙拥墙平,率无限隔,尤宜极力扒除。各镇兵马俱限七月初一齐聚到信地,审时设防,斟酌调遣。”《明实录》的记载,也说明了修建四座战台的原因与背景。

关于战台的建筑及作用,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他的一篇《练兵纪实》中,说得很清楚。他说,“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即险要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缓处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救,左右而立。”“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甃百人,铠仗粮具具备。”“战台中层空豁,四面箭窗;上层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台头、副二名,专管台内军器辘重。两旁主容军士三五

名不等。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节节而制之。”

盐池县的四座战台分别名为四步战台、六步战台、七步战台和八步战台。其中以八步战台最为雄伟壮观。

然而,战台在未毁之前的雄姿究竟是什么样,可惜我等未能目睹。过去很少有照相机,没有人拍下过它的照片,也没有人用文字详细记录过它的形制。这是我们今天考察战台最为困难的事情。幸好,在民国时期,甘肃文史名家慕寿琪老先生有一次到了宁夏。他从灵武县至花马池(盐池县)的考察途中,在天池子地方远远看到了北部长城下的雄伟建筑——八步战台。于是他亲莅其地并登临其上,领略了这座非凡建筑的风采,并将这次实地见闻记录下来,辑入他的历史名著《甘青史略正编》之中,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八步战台的珍贵资料。他的记叙如下:“花马池敌台,在安定、兴武两营之间,各相去五里许。北距边墙不及丈外,围以峻垣,高如堡塞,形方正,每面五丈余,上可走马,有雉堞。南向有门,戍庐马厩之遗迹尚存,意即所谓周庐也。敌台位于中央,高可二十丈,亦作正方形,各边三丈许,接地四丈五尺,具用石

板砌成。以上则尽用大砖,数百年风雨浸润,色如锈铁,浑然化为一。南向亦有小门,仅通人,去地六尺,截然无台阶。由此蛇行而上,左右有铁色厚木板门扉,回首细察,左日似有活动木梯,以备升降。再北面拾级而上,道狭如门,约三十级,后分左右再上各十级,南折豁然开朗,屋舍俨然,颇称宽敞。此殆主帅休憩之所歟。四面蔽以砖墙,每面开纵三尺,横二尺之小窗三,凭窗俯视,懔若临万丈渊。再东循螺旋路而上,至绝顶。远眺,黄沙白草,塞外数百里地毕呈目前。其设备可谓周矣。”

这是盐池县明筑战台较早的最完整最详细的记叙。这一记叙,向我们说明了盐池县明筑战台的构造、规模、气势以及登临其上的心情与感受。亲历或亲临八步战台的人,读其文,会为这位甘肃文史名家细心地观察、全面而又精练的记述而叹服。没有目睹过八步战台的人,读其文,心目中就会浮现出一座气势雄伟而又壮丽坚固的军事建筑。只是他所说的八步战台“高可二十丈”,可能有些夸张。20丈是今天的60米多,约16层楼房的高度。

(作者系盐池县史志办退休干部)

火种,燃起在1925

余鼎铭公馆——马列主义在这里被“合法”传播

余鼎铭是清末民初将领马福祥手下的幕僚,民国6年任宁夏知县。余鼎铭公馆是其任宁夏知县时住的大公馆,上世纪20年代作为冯玉祥率领的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在宁夏的驻地,在推动马列主义在宁夏的传播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史料记载,余鼎铭公馆原址在今银川市兴庆区利群东街原银川一中北院内,在当时是除马福祥将军府外宁夏城的第一幢大厦。媒体“红色印记”特别报道组记者根据史料实地寻访,提起余鼎铭公馆,许多市民在搜肠刮肚后仍是一脸茫然。一些老银川人回忆,上世纪50年代,余鼎铭公馆还被作为银川卫生学校的课堂。时光荏苒,余鼎铭公馆后来被拆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挺拔的现代高楼。

他们将革命的火种带到宁夏

据《中共银川党史》记载,1925年9月,冯玉祥国民联军第二师刘郁芬部开赴甘肃途经宁夏短暂停留。其时,在刘郁芬部做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随之同行。刘郁芬的行辕,就在余鼎铭公馆。宣侠父、钱清泉和同行的便衣随员住在第二进院内。

正是这短暂的停留,把马列主义的火种带到了宁夏,宣侠父和钱清泉沿途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成为最早在宁夏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员。

宣侠父,1899年12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渚池长瀾村,1920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回国后投身革命。1924年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任国民联军三路军政治处处长兼董关县长。1938年7月31日,在西安被蒋介石派特务暗杀。

钱清泉,1895年生,系江苏省江

阴市西门外农家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派到冯玉祥部队做政治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上海找到党组织,任中共江阴县委书记。1928年10月,因叛徒告密,于11月25日光荣牺牲。

宣侠父、钱清泉随部在赴甘肃途中,还在平罗、中卫等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们在宣传国民军入甘的同时,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

举办首期马列主义训练班

五原誓师后,1926年11月28日,冯玉祥率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由五原抵宁夏城。冯玉祥、于右任、刘伯坚等也住进余鼎铭公馆。当时在驻宁部队未哲元师政治处工作的中共党员萧明、伏龙,以及在总政治部宣传队工作的马云堃、李秉乾和《中山日报》记者贾一中等,在银川开展了很多革命宣传组织工作。

同年冬,为培养革命骨干力量,传播马列主义,国民联军总政治部

在总部院内,即余鼎铭公馆,举办了第一期马列主义训练班,吸收部分进步青年参加学习。可以说,余鼎铭公馆是宁夏第一个公开举办马列主义训练班的地方。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训练班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概论》等课程。通过学习,一批进步青年了解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懂得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概念。马列主义在宁夏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训练班也为发展宁夏的革命活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在我区著名文史专家吴忠礼先生看来,正是这次训练班,使得马列主义第一次在宁夏被“合法”传播。

上世纪30年代,著名记者范长江来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于1936年5月到达银川后,宁夏省政府实际处安排他住进宁夏省城接待宾客条件最好的“银川饭店”,而此时的“银川饭店”即为原余鼎铭公馆。(据《银川党史网》)

宁夏党史人物

冯中江:为保护战友壮烈牺牲



冯中江,1966年10月出生于宁夏中卫市镇罗公社(今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九塘村。

冯中江上学时就是一名爱学习、爱劳动、助人为乐的好少年。1980年夏天,一场暴雨使村前的马长沟洪水横溢,泥沙翻滚。一个5岁的小男孩不慎掉入沟里,在洪水中拼命挣扎。危急时刻,途经这里的冯中江毫不犹豫跳进水中,经过20多分钟终于将男孩救上了岸。14岁的冯中江见义勇为的行为受到乡亲们

的称赞。1982年冯中江初中毕业回乡务农。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两年时间里,冯中江与父亲靠买来的一台手扶拖拉机走南闯北跑运输、做生意,很快就积攒了两万多元,家里的日子也富裕起来。1984年11月,正是家里日子越来越红火的时候,冯中江毅然报名参加参军。父母最初不理解,但他说:“家富不能忘记报国,好男儿志在四方,参军能锻炼自己,能得到金钱换不来的东西。”

入伍后,冯中江被分配到陆军第四十七集团军炮兵团四营二连当上了一名炮兵侦察兵。他刻苦训练,在全团侦察兵技术比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后来又成为兰州军区炮兵侦察兵的尖子。在兰州军区组织的炮兵侦察兵尖子集训班,军事指挥学院的一位资深炮兵老教员与尖子兵分组进行比赛,在与冯中江比赛时,两人都不用测距机,先后用望远镜和手指测距,得出的结果不分上下,教员连连称赞:“不简单,不简单!”

1985年底,冯中江随部队赴滇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到达前线后,他四次向营连领导请求到最危险的营前沿观察所执行侦察任务,常冒着生命危险接近目标侦察。一次,在前沿阵地侦察时,班长和他发现前方有一排敌军炮管。为了探清

虚实,他穿过开阔地爬向一片野草丛,架设器材观察,班长看这样很危险,命令他回来,但他硬是用剪刀将遮挡视线的野草剪出两条宽1米、长10米的观察通道,看清了刚才发现的目标原来是伪装的,而在左后方1000米处,才真正隐蔽着3个重型目标。他立即报告,让我方火炮精准摧毁了敌大炮7门,引爆弹药10堆、粮库1座。

为了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冯中江把夜里测得物体的坐标记录下来,白天再测;再把用仪器测得的数据和目测比较。经过刻苦努力,他的侦察技术愈加过硬。他还总结出“晴易近,阴易远,雨雾浓时应减半”的经验口诀,战友们夸他是炮兵的“千里眼”。冯中江经常说:“侦察兵就是炮兵的眼睛,就是指弹员的眼睛,只有练就一双穿透云雾的千里眼,才能完成好战斗任务。”当战友们问他是不是想当侦察英雄时,他说:“没错!我想当个英雄,战争需要英雄,我们宁夏也需要英雄!自治区领导来信说,准备编写英雄谱,希望在书上见到我的名字呢!”

1986年6月15日17时30分许,班长传达上级的指示:“兄弟部队主力受到敌炮火阻击,伤亡严重,前线指挥部队命令我们立即查清敌炮阵地的坐标!”敌人的炮弹已经向我方阵地纵向延伸,火光冲天,硝烟弥

漫,炮弹炸起的泥土不时飞到战士们脸上和身上。为了严密监视敌人活动,准确判断敌炮阵地位置,冯中江不顾随时会被炮弹击中的危险,凭着熟练的侦察技术,迅速选择了观察位置,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敌军炮兵的活动情况。他看到敌军的一长排大炮正在向我方阵地射击,立刻从草丛中站起来,向战友发出了射击指令,战士李涛正要把手射击指令通过电台传递给指挥所,冯中江忽然听到刺耳的轰鸣声,忙喊:“不好!是炮弹!”便立即扑到李涛身上。敌军一发炮弹落在冯中江身后两米处爆炸,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推出5米多远,头部、臀部等7处部位负伤。由于冲击力挤压胸部,造成内出血,经抢救无效,冯中江光荣牺牲,年仅20岁。冯中江牺牲后,部队党委追认冯中江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6年7月20日,冯中江的骨灰由老山前线运回故乡。中卫人民在九塘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7月1日,中卫县委和政府作出向冯中江学习的决定,并在他家大门挂上“人民功臣”的匾额。

1987年1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区人民学习冯中江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移民岁月 第一百二十期

牛琦:陕北的小八路(三)

牛琦:1953年卫生队补充了4名卫生员,都是四川兵,刚补充不到一个星期,就在美军飞机轰炸中两死两伤。有个战友是打太原后参军的,叫李宝生,在轰炸的前两天他还给我们说:家里给说了个对象,回国后就结婚。那会部队上每个月发六块钱,他舍不得花,都攒着,一共攒了八十多块钱,那天飞机轰炸,他说攒的钱还在睡觉的防空洞里放着,就跑去出去要把钱拿到手上,一出去就被炸死了。

1953年,双方的谈判有了结果,每名参战官兵都盼着战争早点结束。牛琦所在的卫生队接到参与交换战俘的任务,能够亲身经历交换战俘任务的人很少。

牛琦:通知我去参加交换战俘,我很吃惊,不知道去干什么,部队领导说,就是到现场看看有没有需要治疗的伤病员。交换战俘在板门店,两边停了很多大卡车,办完手续后双方卡交换的人员向对面走去。美军被俘人员走向他们那边的卡车时都开心得不得了,嘻嘻哈哈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走过来时脸上都很严肃,满脸的苦大仇深。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的被俘人员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伸手向中国人要东西,水壶、毛巾、小背包、香烟,什么都伸手向你,他们要我们就给,感觉他们都很珍惜。但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就不一样了,美军给的东西都给摞下了,有的士兵一走过来,还把身上穿的军服的衣服也脱下来扔掉了,光着膀子走到我们这边。

牛琦所在的部队在停战后又留守了一年多,于1955年初回国。回国后,部队又参加了西藏剿匪。在西藏阿坝地区再次负伤,1957年痊愈后留在了成都陆军医院。这期间,他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在成都军医学院完成了正规医学培训,从普通的卫生员变成专业医务工作者;第二件事是他结婚了,妻子是上海的一名女高中生,这是他在抗美援朝期间收获的成果。

抗美援朝期间,国内青年学生给志愿军写慰问信,开头的称呼全是亲爱的志愿军叔叔,很多女学生还把自己的照片夹在信中。牛琦所在的部队经常接到一堆一堆这样的来信。部队首长说:有时间给她们回个信。在看过照片后,他给几名上海的女学生回了信,回国后与其中的一名明确了恋爱关系。后来部队负责政审的人告诉他,与他通信的女同学出身资本家,不同意他们交往。政审的负责人没想到的是,牛琦还有备手,又拿出一张上海女学生的照片,请领导再去政审。很快上海市公安局出了政审结果,这名同学家庭出身很好,名字叫蒋云端,父亲还是党员,本人也是共青团员,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

牛琦:当时的慰问信很多,我就在信里挑,还多了个心眼,选那些字体娟秀的给回信,回信的内容就是一定要苦练杀敌本领,保家卫国。还让她们好好学习,为国家建设出力,政审的第二个人组织上说行,我马上给她写信,让她到成都来,我信上也说得很明白,来了后同意了就结婚,不同意我再送你回去。就这样与上海姑娘把终身大事办了。尽管我刚二十出头,但已经在外边摸爬滚打了很多年,就是一心要找个受过教育的人。(撰稿 蔺根生 王旭阳)

宁夏工委纪念馆



中共宁夏工委旧址纪念碑。

宁夏工委纪念馆位于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原宋澄小学(现为中共永宁县党校),距永宁县城16公里,距银川市市区25公里,是中共宁夏工委办公旧址之一。

宋澄小学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位于望远镇宋澄堡内西北角,原为一座天帝庙。1936年5月,红军进行西征作战,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惧怕红军占领宁夏,在其统治区内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共产党员马云泽从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四区来到宋澄堡,先是做小买卖,后担任宋澄小学校长,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从此,宋澄小学成为党的秘密工作据点。

1937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工委,加强宁夏地区党的工作。1938年春,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指示马云泽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多次到宋澄小学指导工作。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马鸿逵积极反共,大肆逮捕共产党人,限制和破坏抗日宣传活动,使宁夏工委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39年10月,中央决定派崔景岳、王博来宁夏接替李仰南的工作。当年底,崔景岳与王博来到宁夏,崔景岳以代课教师身份被安排在宋澄小学。

1940年3月初的一个夜晚,崔景岳、王博、白玉光在汉坝小学召开会议,决定重建中共宁夏工委,由崔景岳任书记,白玉光任组织委员,王博任宣传委员,还确定宁夏工委工作机关分别设在宋澄小学和汉坝小学。不久,宁夏工委在宋澄小学召开会议,针对日军侵入内蒙古陕坝地区,并派飞机轰炸银川、吴忠堡和黄河以东各重要城镇等实际情况,制定了工作方案。在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宁夏各地党的工作有了恢复和发展。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崔景岳、马云泽、白玉光、王博、孟长等有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共30多人先后被捕,中共宁夏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2011年,为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永宁县政府在宋澄小学修建了中共宁夏工委纪念馆。2013年,宋澄小学撤并后,永宁县县委和政府将宋澄小学划归永宁县党校作为干部党性教育基地。2016年,永宁县县委和政府决定新建“宁夏工委纪念馆暨党史党性教育教育基地”。2018年被银川市委宣传部门命名为银川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1年5月,被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命名为宁夏党史宣传教育基地。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